

康澤的平生與志事

(三) 陳敦正

總隊改組編為兩師

康澤原所統率之軍委會別動總隊，於民國二十三年底，隨「參謀團」入川，積極從事各項基層工作，設總隊部於重慶浮圖關，總隊延續至民國二十七年，乃有所變動。

民國二十七年四、五月間，由於康澤的工作繁重，別動總隊曾增設副總隊長一人，代行總隊長職務，由黃珍吾擔任。六月，總隊部移駐湖北襄陽以南之南漳，黃因另有任用，在行軍途中辭職，由參謀長劉伯龍繼任總隊長職務。

別動總隊部原設於重慶，康澤因擔負各種任務，在武漢時間居多，故在武昌賓陽門外「長春觀（道士廟）」設置辦事處，指揮一切。由於康澤之工作過忙，又由於抗戰軍事節節轉進，爰經建議：成立荆沙警備司令部，以別動總隊為基礎，由劉伯龍任司令，實際上，別動總隊職權，已予轉移。

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，原有編制，甚為龐大，實際上相當於一個軍的編制，隊員均為知識青

年，絕無文盲，故素質頗高。總隊下設支隊、大隊、中隊、區隊、分隊，與部隊建制，完全相等，祇是名稱不一樣。

別動總隊，除正規編制外，分駐於各淪陷區的，稱為縱隊或支隊，縱隊相當於師的編制，支隊相當於旅的編制；如在山東的縱隊司令，由秦啓榮擔任，即其一例。其餘的除「軍史館」或許有資料可查外，已不可考。

據曾在別動總隊服務，現任花蓮縣立圖書館館長之王景華云：「別動總隊於二十八年六月，自湖北南漳，再移駐四川璧山，改編為新二十八師及新二十九師兩個師。劉伯龍（貴州龍里縣人），任新二十八師師長，馬維驥（四川人，原別動總隊第二支隊長），任新二十九師師長。旋不久，開往滇緬路，參與盟軍併肩作戰序列，隸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部官羅卓英部之第六十六軍節制（軍長為張軫）。」

劉伯龍與賀明軒，原為別動總隊總隊附，其後劉始調任為參謀長。萬子霖曾一度擔任總隊部主任秘書，余拯（號博倫，湖北人，來臺，在立

法委員任內去世）任交通組組長，劉清源任指導組組長（劉清源，安徽人，政治大學一期。現在臺，曾任裝甲兵學校政治部主任，省黨部考紀會委員，縣黨部主委，現任中國市政專校訓導主任）。別動總隊第一支隊長，由曾晴初（四川隆昌人）、公秉藩，先後擔任。第二支隊長則由馬維驥擔任。上官業佑曾任一支隊主任指導員，其後由廖德雄（湖南常德人，在臺）繼任，二支隊指導人員，及其他主要幹部，一時難於記憶。

二十七年十月下旬，武漢撤守，中央黨政機關，播遷入川。中央團部由武漢而長沙、而衡陽、而桂林、而貴陽、而重慶，於二十八年年初，始安全到達。於時，康澤仍奔走各地，未遑寧處。其辛勤勞碌，非局外人所能臆測。

主持訓練負責認真

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—已卯），政府播遷入川，各機關稍事就緒後，中央為統一抗戰意志，齊一抗戰步驟，在重慶復興關，成立中央訓練團，由蔣公自任團長，王東原任教育長，下設三個

委員會，其中黨政訓練委員會，由朱家驊任教育處長，康澤任副處長，吳幹、高廷梓、白瑜、汪少倫（以上四人，均現任立委，汪近已病故）、萬子霖等，分任秘書、指導組長、課務組長等職；朱常因公，不克兼顧，由康主其事。就訓育幹事而言，多黨政名流，其中與康有怨者，常推年齡較長的，如邵力子之流，予康以杯葛，且常詆毀康於蔣公之前，康蒙冤順受，縱使被領袖申斥，從無怨言。

稍後，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訓練班，亦劃歸中央訓練團序列，稱中央訓練團第四大隊，但仍維持「青幹班」既有體制。其第一期訓練，已在武昌珞珈山武漢大學，訓練完畢，分發各省各地，展開團務工作。自第二期開始，以迄第五期，均在重慶馬家寺集訓，張治中以中央團部書記長名義兼班主任，康澤以組織處處長為副主任，張從來不到，而由康負責實際責任。康辦訓練，是十分認真的，除每週精神講話以外，必分批約集學員，個別談話，以確切瞭解學員的思想、意志、學識、能力、品德、體力、精神……等等。

在談話之前，對學員的自傳，以及有關部門所提供之考核資料，均先予核閱。在談話過後，對學員之考核，經常在名冊上，標示各種符號，以加深他個人對學員的印象。如：半圈、整圈、雙圈，以及「、」（表示印象不佳）、「？」（表示有問題）、「✓」（表示須再次約談）等等，至為詳盡，這些符號，對學員日後的分發任用，是有相當影響與關係的。

曾任青幹班的主要幹部，有吳兆棠（任教務

組組長，安徽休寧人，留德博士，來臺後曾任臺灣省教育廳長，已故）。湯如炎（任訓育組組長，湖南醴陵人，號肇武，軍校四期，中央團部組織處副處長兼。實際上由大隊訓育幹事代理。湯來臺後，曾任中央常務委員、立法委員等職，已故）。鄭維漢（訓育組組長，繼湯如炎後擔任。鄭為湖北漢川人，來臺，任立委，已病故）。陳敦正（任大隊訓育幹事，並兼代訓育組長職務，湖南長沙人）。朱鶴賓（任中隊訓育員，在臺，曾任臺北市府新聞處長，現任政大教授）。許伯超（任秘書，四川人，留日學生，在臺，曾任輔仁大學、東吳大學訓導長等職。）其餘主要人員，一時失記。

安定後方接連西北

民國二十八年，王續緒（號治易）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，有川軍七將領反對王續緒出主川政的通電，發生紛擾，無異動搖後方，形成後方空虛之狀。七將領之中，以第十八師周成虎部為中心，而周之旅長彭斌，不但為周成虎之靈魂，亦為七將領集團之主謀。當時，彭斌所擬訂之「聯合動亂」計畫，頗為周密，但為中央所偵知，並悉其各處設防情形。適抗戰方殷，深恐影響國際視聽，在中央慎謀之下，不以武力解決為原則，經康澤策劃，從事安撫，並透過瀘縣縣長袁守成（現國大代表，曾在本誌七月號發表金陵問學記，在臺），密主其事，採「安彭即安周，安周即安其他將領」之方針。彭因熟讀舊書，袁以忠義動之，故後方得以安定，實康運用與指導之力也。

同年九月，康澤正式擔任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，在此之前，中央鑒於西北青年，在中共勢力擴張之下，徬徨苦悶，無所適從，爰在西安，成立中央軍校西北訓練班，廣收西北青年，由康澤任主任，顧希平副之，但康因事忙，始終無法前往視事，乃請辭。蔣公派胡宗南接替，改名為中央軍校第七分校。康真除組織處處長之後，時值戴雨農（笠）兼任胡的重慶辦事處處長，胡電戴笠，邀康澤前往西北一行，共商國是意見。戴接胡電後，比即透過康的私人秘書蕭之望（蕭先蔭，號之望，湖南益陽人。曾追隨康澤服務頗久，來臺後，歷任立法院秘書處長、副秘書長，現任立法院秘書長），與康聯繫。有一小小的事例，可見康澤，在當時是頗受各方面尊重與注意的。

康住在重慶兩路口兩浮支路，戴住曾家岩窠子風樞，兩地相距，或許不到一公里，距兩路口各約半公里左右，戴笠表示：在康去西北之前，必須代替胡先生（指胡宗南），先行招待一次，康堅辭未允。至期，戴親自電話詢問蕭之望，康何時出門赴宴，謂將親自相迎，以示禮貌。康聞之，謙遜不可，而戴竟親自迎康於兩路口。而康去西北，胡又派大軍列隊，郊迎三十里，（今日在臺灣，似已革除了此種不必要的禮節），亦可見彼等對康之禮遇和重視矣。

康之去西北，任務如何，此時已記不清楚，但與結合西北青年，加強思想訓練，策進剿共大計有關，自無問題。

竭智盡忠奉命惟謹

民國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—庚辰）至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—乙酉）上半年，康澤的大部分時間，在筆者記憶中，除到過一次滇緬路，傳達軍機外，似乎未曾遠離四川省境。仍兼多項要職，處理公務，並不斷為蔣公介石交付之各種特定任務，竭智盡忠，奉命惟謹。

他的住宅，就在筆者住宅的對面——兩浮支路的斜坡上，朝東北方向，一邊靠近軍委會政治部，一邊靠近中央青年服務社，正對面是中印文化協會，斜對面便是中央團部所在地的通滙中學，我與涂公遂（涂公遂，江西修水人，前中央團部組織處處秘書，現任立法委員，香港珠海書院教授）、湯如炎（曾任立法委員，在臺逝世）三戶，同一個大門，住在中央團部大門口的左側，我的窗戶靠兩浮支路馬路，一眼我便看到康宅的實際情形，也經常看到康宅人來人往，深夜不停，可知其忙碌情形，星期例假，亦不例外。

康宅僅有便衣警衛一人巡行，中央團部警衛人員，就在對面，亦可彼此呼應，但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意外事故。康宅僅是一棟臨時建築的五開間的平房，起初沒有圍牆，進門即是客廳，設備非常簡陋，簡直連我現在在臺北住宅的設備都不如。汽車祇能在兩浮支路的馬路上停下，而不能直接的開上坡去，要慢慢的一步步走上去，大約有二十三十級，已記不清楚。我記得他有一次約請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王芃生（原名大楨，湖南醴陵人，國際問題專家，有名的「日本通」，曾

任交通部次長，抗戰勝利後，因腦溢血去世），到康宅吃午飯，王的體型矮胖，又患高血壓，是我陪他去的，王的汽車到了門口，無法上坡去，還是特別準備「滑竿」抬上去的（「滑竿」是四川有名的交通工具，由兩人抬乘，便於爬坡。因重慶為山城，高低不平，有很多地方，不能通車，賴「滑竿」輔助）；康則習以為常，上下自如。

康的請客，非常簡單，多半是五菜一湯，人多時則是六菜一湯，遇年輕人時，甚或是「一品鍋」上桌（一品鍋即是將所有的菜，燉在一起，為軍中所習見），大家吃個痛快，是由自己廚師做的，清潔實惠，美味可口。

其實，康的請客，並非真正的請客，而是充分利用吃飯的時間，約些有思想學問的人，在家中以便餐招待，有時候，也約些各機關的中上級幹部談話，藉以瞭解各種實際情況。他與人談話，無不誠懇懇，蓋如此，可多多知人，以為國家物色有用之才也。

康澤對時間的支配與運用，在我生平所見的愛人中，可能是最能充分利用時間的人，他將時間價值，利用至最高點，決不浪費。例如：他在武漢時，有專用渡輪，常常利用輪渡的時間，約見必須見他的人，或者有關單位急待解決問題，而必須面談的人；或來自遠方，有公務接洽之人。再不是，就是約集幕僚人員，批閱公文或指示處理事項。

利用機會接近青年

康澤生平極好結交有學問的專家學者，虛心求教，因工作太忙，常是抽不出時間，在平時，是利用在家吃飯的時間，與學者專家交談；武漢時期，更是連輪渡的時間，亦利用了。當時，由武漢至南京等地，尚非如今日飛機之便，必需乘坐一兩日輪船，方能到達，康一定利用時間，約請專家學者，或高級幹部，同乘一輪，研究各種實際問題，而由康付給來回旅費，故多欣然應邀。有一次在重慶，有人介紹一位在北平的學者給康，康急於一見，亦由康送給來回飛機票，得以欣然相晤。

在武漢至重慶的一段時間，兵學家楊杰（耿光），對康之抱負與為人，深為激賞，楊為康講授「大軍統帥與軍事哲學思想」，達一年有餘，康澤總是虛心聆聽，並詳為筆記。又如在重慶，主持組織處時，大家在一個大辦公室辦公，康總是利用每天上辦公時的前半個小時、至一個小時，倡導同仁閱讀三民主義等有益的書籍，每次指定一兩位同志，就每一講的內容，或某章某節的內容，輪流提出報告，蔚成讀書的風氣，求知的風氣，做到了機關學校化的理想境地。可概見其自己為學，與領導同仁求知的精神。

康澤的生活，我所記的，僅是所知的一些片斷，他的一生，多采多姿，為各方所重視。他的夫人朱素懷女士，却絕少和他在一起應酬，或遊山玩水。祇有過年過節，始有機會，陪夫人在一起吃飯，座車亦不為夫人所利用，其生活嚴謹，有如是者。

康澤的生活與工作，最值得一提者，就是他

充分利用機會，與大專青年學生接近，康在青年團每年舉辦的夏令營，如南溫泉夏令營、北碚夏令營、成都夏令營、……等，都是自兼主任，與青年生活，打成一片，樂此不疲。他的青年朋友和幹部，都樂於與他親近。他在平時規定，每週接見一般請見的客人兩次（特約者例外），人如潮湧，可以形容得上，如蜂之赴壘。康之組織天才，有如磁性一般，自幼如此，天縱之資也。

當選立委就任司令

民國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—乙酉），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，於五月五日至廿一日，在重慶舉行。接着五月廿八日至卅一日，舉行第六屆一中全會。八月，日軍正式投降，政府基於復員工作之重要，派康澤出國考察各同盟國家戰後復原工作，以供參採。康在重慶近郊白市驛機場，搭上美國軍用飛機起飛，先至美國，後至各地，以迄行憲後第一次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前夕，始行返國。出國時間，約為兩年。

大選結果，康澤當選為行憲後第一屆立法院立法委員。康鑒於當前國家情勢，思想紛歧，中共雖未參加民意代表選舉，而共黨政治攻勢，却於今為烈，民主黨派，推波助瀾，謬論殊多。為加強議會功能，促進國家建設，亟思在為數約六百人之立法委員中（就當時報到人數而言），就立場超然公正之士，聯繫接待三分之一，藉以溝通思想，忠誠擁護中央，使領導中心，基礎得以鞏固。此項構想，原為政黨政治之常軌，亦為政黨政治應有之運作，事商於戴季陶先生，深為嘉

許與支持。時，康已在六屆四中全會，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，一般忠誠黨員，咸表同意，戴先生並擬以在京之私有「孝園」（在南京新街口附近之五台山，為戴傳賢私人別墅，據說為川軍將領於戰前所購贈。）作為集會之所，其正式名稱，為「新政俱樂部」。終以局勢動盪，政府播遷，而康奉命為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，鏡花水月，並未付諸實施。人亡政息，死者為尊，照莊子的說法是：「死者無天於上，無地於下，無敵於前，無顧於後」的，特表而出之，已經不是機密的事了。

民國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—戊子），康於大選前夕回國後，已當選為第一屆立法委員，且擬成立「新政俱樂部」，大幹一場，終以國難當前，赤禍猖獗，當局以康澤為國家有用之材，不應蟄居後方，而應立於前線；不應以言責督促政府，而應以行動捍衛國家。屬意以「熱河省政府主席」及「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」，由康選擇。康澤首以「考察熱河黨團合併」為名，先去熱河，作實際上之瞭解。時，趙自齊（熱河人，現任立委、中央政策會秘書長）任熱河省青年團書記，知熱河已被中共四面包圍，僅有石壁（在臺，號為開，廣西人，曾任銓敘部長）一個軍防守，知其不可為。歸來後，當局又以「綏靖區」事重提，康為軍校學生，素以服從為天職，又以受蔣公介石特達之恩，早已養成「以國家為己任」的胸懷，祇要有益於國家，明知其不可為，而有「勇於為之」的擔當。故未便違旨，毅然捨立法委員而赴襄陽，就任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。

行前種種繫於預見

康澤赴「綏靖區」就任之前，在南京的舊日幹部及老友，曾分別為康餞行。有時，康澤亦主動邀約有關人員，至其家中便飯，聽取友好有關「赴任」的一般看法與意見。大家的看法，與樂恕人、毛樹清對康澤所提供的意見，大致相同，他們的意見是這樣的：

「第一，他過去未曾帶過大部隊作戰，而又無自己的基本隊伍和指揮幹部，現在要靠郭勳祺（號翼之，四川人，第十五綏靖區副司令官，曾任川軍軍長，為唐式遵、劉湘舊部，曾與劉伯承同隸川軍一軍系熊克武部任團長，交情甚厚，居中策應，遂致着着敗退，實有共謀臥底之嫌。）和地方雜牌部隊，不能不特別當心。

「第二，打日本軍隊易，打共黨軍隊難！國內戡亂大勢，破綻已露，原因太多，這番回去，希望他特別珍重！」（見樂恕人憶人記事集）

我那時正在南京，擔任中央訓練團新聞幹部訓練班少將總教官兼教務組組長，他約新聞班的副主任易謙（號克新，湖南長沙人，在臺），去做他的參謀長，易與我同鄉，因此約我一同去他家吃飯，曾有人戲言「關公走麥城」的故事，囑康澤務必謹慎其事，不要掉以輕心，言下似有不吉之兆，而竟成日後讖語，今日我寫這段回憶，言猶在耳，不勝唏噓之感。

記得康澤在去「綏靖區」約半個月之前，許君武（號筠廬，湖南湘鄉人，前中國日報總主筆，政治部第二廳主任秘書，當時為社會部部長谷

正綱的辦公室主任，三十八年來臺後迄今，歷任各大專院校教授）去見他，認為他已當選立法委員，而且聲望很高，下屆院長，非他莫屬，勸他慎重考慮，不可棄立委而去襄陽，康澤說：「我生來是學軍事的，但一直沒有帶兵指揮過作戰，領袖這次特別知遇，要我去增加經驗，是十分看得起我，我豈能違命不去，你說的全是書生之見，我不但自己要去，更希望你也能去。」

康澤對許說的這一段話，固然出自忠誠，但我想提供一點背景資料，證明康澤的赴任，或許有某種程度不同的苦衷，隱藏在心，殊難臆斷。在民國三十五年，樂恕人和毛樹清，於華盛頓及紐約，與康澤重逢話舊，有如下的一段記載

「抗戰勝利結束，戡亂軍事開始不利，康澤在政軍舞台上，因鋒芒太露，受到『圍攻』，因而空前失意；落得個奉派赴歐美考察軍事復員的閒職。這對一位曾握過特殊權柄的軍人來說，無疑是極為慘痛和無聊的遭遇。」

又說：「但我確能記得，他（指康澤）對國家對黨，仍然忠心耿耿，只不過對政府某些人事、某些政策，極表不滿而憂慮。照他當時的看法，他首先反對『整軍』，認為『整編』武裝兵力，尤其是整編地方部隊，即等於『裁軍』，也即等於幫助共黨『建軍』。」

對於國家用人，他特別有極其感慨與沉痛的論斷。他有至理宏論如下：「我仔細研究過古今中外的歷史，得到一項重要的結論，即是：每當一個國家在開創或中興的時候，用人唯才；到了

持盈保泰，就講求學歷經歷；但一到衰敗，用人就只問交情或關係了。」

「我們當年對康澤這一番話，擊掌稱善。直到最近幾年，我寫兩篇時文——『中興和人才』、『重整旗鼓，慎選人才』——還不惜兩次引用康澤這幾句話作為副題。今日第三次再為引用，確有針砭國家中興行政用人的意義，不可因人而廢言！」

康澤平日的為人，和對國家政策的堅持，有其自己的定見與定力，於此可見其卓越處。他捨立法委員而就任綏靖區司令官，在行前眾說紛紛之下，作此抉擇，實繫於個人之定見。蓋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，念茲在茲，非如此，不足以報國家和領袖之恩寵耳。

成仁取義生死以之

康澤就任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時，他的別動總隊，已在八、九年以前，早已改編為新廿八師、新廿九師，不歸他指揮了，故康澤根本無基本部隊可言。配屬部隊，又極有限，所有防區內的部隊，又受白崇禧（號健生，廣西桂林人，精嫻韜略，有小諸葛之譽，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病逝臺北。）之調遣與節制，在兵力薄弱，不可抗力情形之下，卒於三十七年七月十七日，為共軍所乘。他「戰至一兵一卒，一槍一彈，康將軍自殺的手槍，被郭勳祺打下來，身負重傷，被敵人尋獲後，是用擔架抬出坑道的。因受重傷，又中了毒氣，人是昏迷的。」（見萬子霖懷康澤將軍文）卒至被俘受辱，折磨至死。碧血丹心，忠勇足

式，千秋義烈，令人景仰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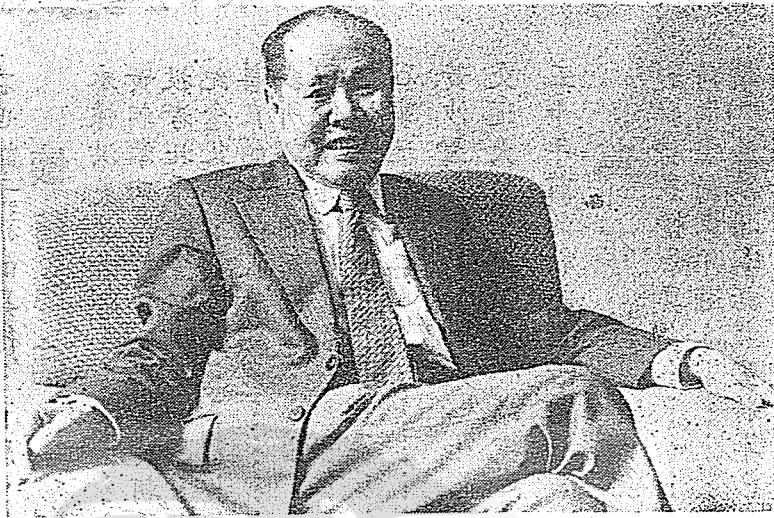
康澤之被俘，距其到任時間，為時甚短，僅三數月之久。迄六十二年（一九七三）春天，中共宣佈康澤的死訊，已是被俘二十五年了。關於襄（陽）樊（城）之役，其詳細佈防、兵力、作戰及其被俘、以至折磨至死情形，均見「萬文」。

讀之令人肝膽俱裂，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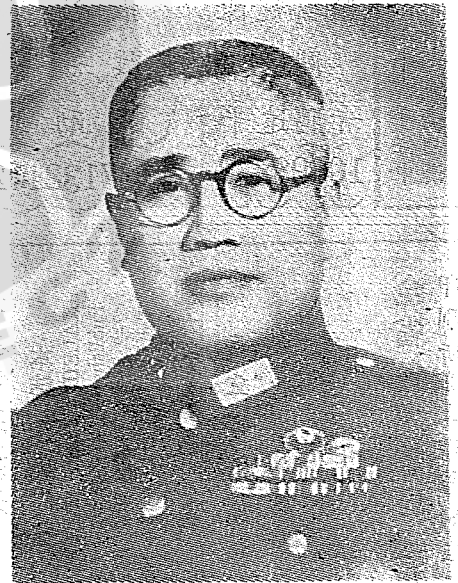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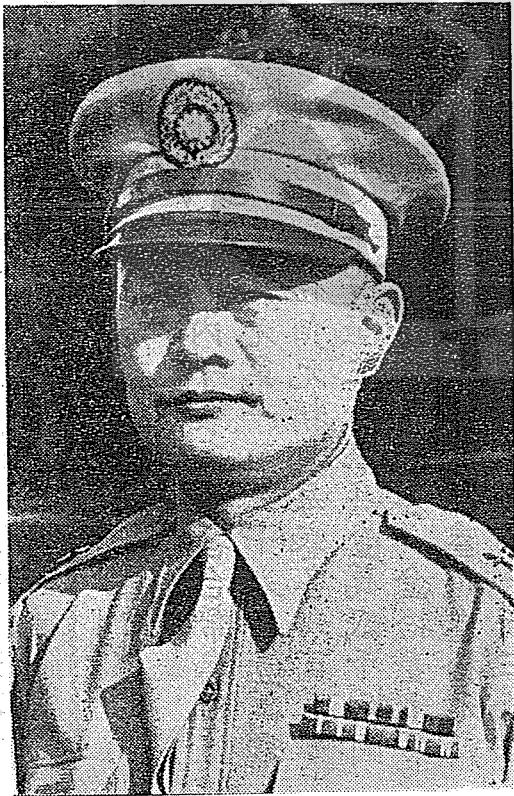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五十五年（一九六六—丙午），康澤的一位親屬，得到美國紅十字的協助，由美國前往大陸共區，在中共安排之下，在北京某一醫院，見到了康澤。是時，康澤已被俘了十八年，康澤素體健，已經折磨得虛弱不堪，不但衣服襤褸破碎，而且患了嚴重的高血壓病。住醫院醫病，當然不是真的，而是他的親屬，持用的是美國護照，又是經過美國紅十字會安排的，因此，特意安排着康澤，住進醫院，藉此「統戰」一番，以表現中共「人道」精神，並不虐待戰俘而已。

其實，康澤在被俘期間，「曾被判勞改十一次，包括零下二十七度的人間地獄似的佳木斯集中營；他的牙齒脫落得沒有了，不是自然脫落的，而是在受刑時，一顆一顆被老虎鉗錯掉的，故意慢慢搖、慢慢扯、硬生生拔落的（當然不會打麻醉針）。他曾被判死刑三次，可是三次都沒有執行，而被毛澤東要花樣『特赦』了。使將軍壯志難酬，繼續忍受折磨，繼續忍受苦難，一至於死。」（見萬文）。康澤死亡的正日期，是何年？何月？何日？何時？何地？中共並沒有詳細宣布，不得而知。假定是六十二年（一九七三）春天，中共宣布的時間。康澤已被俘受辱長達二

福建省政府主席、「烟波浩瀚怒濤澎湃」作者戴仲玉先生近影（文見十八頁）。



康澤將軍任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時的照相（文見一四一頁）。



抗日時期率軍遠征緬甸、擊敗日軍。
。軍將湘耀廖的域異功立
。（文軍將才家喬頁八一見參）